

中華文史論叢

第五十輯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中華文史論叢

第五十輯

錢伯城 主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

滬新登字109號

本輯責任編輯
谷玉 江雄

中華文史論叢

第五十輯

錢伯城 主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272號)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祝橋新華印刷廠印刷

1992年12月第1版 1992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 7-5325-1455-2

Z·211 定價: 3.50 元

目 錄

- 敦煌學：開拓與發展……………魏同賢(1)
- 俄羅斯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聖彼得堡分所藏敦
煌文獻
- 附錄：前蘇聯敦煌學研究論著目錄……………〔俄〕孟列夫(7)
- 上海博物館藏敦煌吐魯番文獻綜論……………李偉國(29)
- 對黃編《六百號敦煌無名斷片的新標目》之
補正……………方廣錫(49)
- 金山國史辨正……………榮新江(73)
- 王梵志詩校釋補議……………黃征(87)
- 1914—1915年俄國西域(新疆)考察
團記……………〔俄〕П. E. 斯卡奇科夫(109)
- 1914—1915年俄國西域(新疆)考察團
資料研究……………〔俄〕孟列夫(119)
- 吏隱：謝朓與大歷詩人……………蔣寅(129)
- 高麗唐樂與北宋詞曲……………吳熊和(157)
- 論宋僧詞……………曾棗莊(173)
- 孔子的辯證觀點……………周振甫(187)
- 齊國兵學甲天下……………李零(193)
- 馬王堆漢墓若干史實鉤沉……………劉曉路(213)

漢代“婦人言色亡國”論之發展·····	劉詠聰 (231)
《世說新語》人物言談中稱名與稱字的 考察·····	柳士鎮 (247)
論章太炎與魯迅的早年交往·····	章念馳 (263)
《大雲經疏》撰僧名姓小考·····	楊繼東 (271)
原壤夷俟說·····	金性堯 (192)
留鑑錄·····	羅繼祖 (6)(48)(72)(86)(118) (156)(186)(230)(302)

敦煌學：開拓與發展*

魏 同 賢

當歷史的車輪由上個世紀向本世紀馳進的時刻，在積貧積弱、列強凌欺的中國大地上，却接續產生了被稱為中國文化史上四大發現中的兩大發現，這就是一八九九年“殷墟”甲骨文的發現和一九〇〇年敦煌文獻的發現。前者在河南安陽小屯村先後發掘的十多萬片甲骨，已將我國有文字記載的歷史提前了數百年，為商朝的歷史研究提供了可信的資料；後者在甘肅敦煌縣鳴沙山莫高窟第288號洞窟的秘密藏經室中發現了數萬種手寫卷軸和刻印典籍以及繪畫、雕塑等等，它的學術價值雖然尚未被全部認識和利用。然而，從藏經室中所發現的產生於四世紀中葉至十一世紀初的大量用漢文和梵文、藏文、粟特文、回紇文、于闐文書寫和刻印的文書以及多姿多采的繪畫、雕塑，廣泛地涉及我國西部和中亞地區各民族古代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生活，它所提供的真實獨特的資料，已經有力地啓動并迅速地推進了對我國古代和中亞地區社會的政治、經濟、法律、宗教、語言、文學、科技、藝術和風俗等各學科的研究，填補了一些迷失已久的學術環節。同樣令人鼓舞的是，於敦煌藏經室打開的前後，在新疆吐魯番及塔里木盆地庫車、和田、尼雅、樓蘭等地區，也發現了大量的古代遺書，其出土地域同敦煌接近，而文書年代、內容和形態亦與敦煌文書相若。這批被學術界稱之

* 這是為《敦煌吐魯番文獻集成》所寫的“策畫弁言”，題係編者所加。
《敦煌吐魯番文獻集成》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爲吐魯番文書或西域文獻的資料同敦煌文獻相聯繫、印證、輝映，從而孕育并推動了一門國際性學問——敦煌吐魯番學的誕生與發展。所不同的是，“殷墟”甲骨的輯集、印製已經大體完成，這就爲深入的研究創造了條件，而敦煌吐魯番文獻的公布、輯集、印製却遠未實現，這自然給敦煌吐魯番學的深入發展造成了困難。

敦煌文獻的發現早已載入文化史冊，這無疑是學術史上的盛事和幸事，它本該立即清洗被封閉了近九百年的歷史塵垢，輝耀出它那炫目的學術光采。然而，一則文化史上的任何新發現都有一個被認識的過程，再則這批文化上的無價之寶一經面世，便被割裂分散，英國的斯坦因、法國的伯希和、俄國的奧登堡、日本的大谷光瑞考察團，紛至沓來，各有裹攜，而刼餘之物，復遭散佚，以至目前除英國國家圖書館、法國國家圖書館、俄國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聖彼得堡分所和北京圖書館爲著名的四大度藏家之外，散布在中外公私收藏家手中者不知尚有幾許，再加上有意無意地人爲障礙，從而造成研究工作的困難，影響了這批珍貴文獻的學術效應，這是曾使不少正直熱心的敦煌學家扼腕痛惜的。

因而，敦煌學儘管目前已成爲一門國際性的顯學，可它的誕生和發展却是曲折而緩慢的。早期的學者如羅振玉、王國維、蔣伯斧、劉師培、繆荃孫等人依靠伯希和等所提供的有限照片和原件，開始了艱難的研究工作，他們辨識著錄、撰寫序跋，產生了一大批學術成果，而敦煌學的正式命名則遲至三十年後的一九三〇年。嗣後，我國學者董康、劉復、胡適、王重民、向達、姜亮夫等先後遠涉重洋，奔赴倫敦、巴黎，拍照片，抄遺書，編目錄，寫序跋，爲敦煌學的發展作出了卓越的貢獻。而陳垣、陳寅恪等更以他們的研究碩果爲敦煌學增添了光彩。而英國的斯坦因，法國的沙畹、伯希和，德國的格倫威德爾，俄國的奧登堡，日本的內藤湖南、那波利貞等等，也對敦煌文獻的整理、研究作出了各自的貢獻，爲敦煌學的開創和發展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與中國的敦煌學家共同推動了敦煌

學的前進。到目前，敦煌學更有了蓬勃的發展，國際性的學術研討會已經數度舉辦，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已經建立數年，一些有影響的敦煌吐魯番學家如季羨林、唐長孺、饒宗頤等等正同一大批中青年學者進行着深入踏實的研究，學術成果不斷湧現，呈現了敦煌學的初步繁榮景象。

這種景象的確是令人鼓舞的。它的出現自是中外數代敦煌吐魯番學家心血凝聚的成果，如果從工作環節的角度考慮，敦煌文獻的輯集印製同敦煌學的整理、研究則是緊相連接又互為促進的。初期的敦煌學著述往往同輯印文獻合二而一，諸如羅振玉、蔣伯斧、王仁俊等的《敦煌石室書目及發見之原始》、《敦煌石室真迹錄》、《敦煌石室遺書》、《鳴沙石室佚書》、《鳴沙石室古籍叢殘》等都是交互出現的，這些都是對敦煌文獻整理的成果，同時也是對敦煌文獻認識、研究的成果。進一步，在對這些資料進行縝密科學的研究，方才產生了王國維、陳寅恪等的學術著作，從而奠定了敦煌學的基礎。此後的發展在在都顯示了文獻的刊布滋助了研究的進步，研究的進步帶動了文獻的刊布。不僅如此，敦煌文獻的刊布同敦煌研究的發展還存在着同步前進的現象。敦煌所發現的文獻，不論屬傳世文獻的補充，還是遺佚文獻的重新出現，都帶有孤本的性質；加以出現之後，即被分藏於世界各地，甚至同一件文獻，復遭割裂、破損，造成了嚴重的分散。況且，各藏家的管理觀念和制度又極不相同，從而造成了閱讀、使用的不便，這不能不被視為是對學術研究的嚴重限制。正是由於存在這種限制，所以，在近一個世紀的漫長歲月中，敦煌學雖然已從無到有，從小到大，有了長足的發展，出現了初步的繁榮。然而，如果從敦煌文獻所提供的應有價值來看，已被開發利用的，無論從宏觀的整體研究還是從微觀的具體研究，那都還是有待進一步推動的。為此，作為前提條件和資料依據的，自然還是提供研究的資料。而這，最理想的辦法是創造條件使有志於此的學者都能閱讀原始文獻，不過這在目前的客觀物

質和主觀認識條件下，大概都還無法實現。於是，退而求其次，商得各收藏家（單位或個人）的贊同、協助，採取現代影印方法，輯集彙刊，使孤本文獻化身千百，讓敦煌學家身處書室，即能縱覽敦煌吐魯番文獻全貌，既省却奔波旅行之苦，又免除四方求閱之煩，以其寶貴而有限的學術時間，悉心於閱讀、分析、推論、判斷，從而得出科學的結論，這結果就是從根本上推進了敦煌學的發展。這就是我們輯集出版《敦煌吐魯番文獻集成》的目的。

我們輯集彙印的《敦煌吐魯番文獻集成》的預期目標是：一、相對完備。我們將盡力搜求、輯集，將敦煌、吐魯番等地區出現的各種文字資料和藝術資料，盡可能完整地反映出來，使其成爲一部總匯式的集成文獻；二、力求存真。敦煌吐魯番文獻具有文獻和文物兩重價值，這就要求對文獻的印製必須逼真，其大小、長短、形狀、色彩、字迹、殘損自不必說，即使是紙質、卷軸、包封等等也不宜忽略，當然，將立體的實物通過平面的圖像反映出來，是會受到若干限制而有所失的，但失而不損其真，圖版力求其像，則是我們工作的一項核心要求；三、定名準確。給敦煌吐魯番文獻定名本身就是一項研究工作，數代學者已經在這方面做過深入的考訂，我們將汲取這份可貴成果，作爲我們編輯工作上的依據或參考，並進一步聽取學術界的意見，盡其所能地給文獻準確定名；四、編排合理。本集成是一套大型的資料性圖書，中心目的在給學術界提供一份全面可信的原始資料，因而，文字部分如前言、凡例、目錄、題解、索引等等，均屬說明性質，意在方便使用；圖版部分則按序排列，重在實用，兼及欣賞。做到圖文結合，以發揮資料圖書的最佳效果。

本集成雖爲我們所籌畫、推動和實行，可實在也是中外熱心於敦煌學的有識之士合作贊助的成果，像已列入第一批出書的上海博物館、上海圖書館、北京大學圖書館、天津藝術博物館、俄國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聖彼得堡分所、法國國家圖書館等等，我們表示衷心的感謝。在籌畫、編輯過程中，我們還得到了中外敦煌學家的熱

情幫助，他們曾給予了我們多方面的支持，特別是北京大學季羨林教授、臺灣潘重規教授、香港大學饒宗頤教授，他們於百忙中出任本集成的學術顧問，使本集成的編輯印製得到了可靠的學術保證，在此我們特申謝忱。我們還認為，任何圖書的最具權威的評論家是該圖書的使用者，我們特別期望着他們能夠根據各自的需要提出改進的建議，在這裏，我們則要先此致謝了。

一九九二·七·十二

(本文作者係上海古籍出版社社長)

留 鐙 錄

羅 繼 祖

湘 陰 夢 囈

歐陽兆熊《水窗春囈》云：“左恪靖少予十五歲，其中鄉榜却先予四科，戊戌計偕北上，遇於漢口，即結伴同行……是日各寄家信，見其與筠心夫人書云：‘舟中遇盜，談笑却之。’因問其仆：‘何處遇盜？’仆曰：‘非盜也，夢囈耳。前夜有誤牽其被者，即大呼捉賊，鄰舟驚起，故至今猶聲嘶也。’予嗤之曰：‘爾閨閣中亦欲大言欺人耶？’恪靖正色曰：‘爾何知，鉅鹿昆陽之戰亦只馬班敘次得栩栩欲活耳，天下事何不可作如是觀！’相與大笑而罷。”

予按：湘陰乃跡弛不羈之士，在蜀督幕，駱文忠能虛衷聽之，故無間言，與湘鄉則多牴牾，緣兩人稟賦不同，湘陰晚年建樹爲人所稱，聲望遂出湘鄉之右，蓋譎而近正者。此雖一時戲言，却可見其真性情。謂鉅鹿昆陽之戰出馬班筆遂栩栩欲活，正不知費了多少渲染，惟馬班爲文筆之傑，又不當與稗官並論也。

前見《新民晚報》林放《未晚談“想象”的漏洞》一則，舉《左傳》晉靈公遣刺客刺趙盾，後刺客知盾乃忠臣，而已所爲爲不忠不信，乃觸槐自殺一事，謂刺客之言誰實聽之而記之，不可謂非漏洞，因論現代之報告文學及新聞通訊類此者多，得毋有出之想象如《左傳》者。予謂湘陰此事亦可參證，湘陰因人誤牽其被而大言遇賊，若人從而記之，得勿以夢囈爲實事哉！古今如是者多矣，又能一一備論其真與僞耶？

俄羅斯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聖 彼得堡分所藏敦煌文獻

〔俄〕 孟列夫

俄羅斯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聖彼得堡分所敦煌特藏，是中國甘肅省敦煌縣莫高窟(即著名的千佛洞)漢文寫卷收藏品，為道士王圓籙於1900年從封砌於窟壁的密室中發現的石室藏書的一部分。敦煌石室藏書總量(包括殘卷)粗略估計(總數未公佈)達35,000~36,000件。目前這批遺書分成幾部分藏於世界各國藏書館中。除了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聖彼得堡分所之收藏外，最大部分藏於倫敦大英博物館(10,000餘件)，巴黎國家圖書館(3500餘件)和北京圖書館(約10,000件)，少量存於日本(主要藏於京都大學，連同私人收藏達500件)，印度德里(斯坦因收藏品，寫卷數不詳)，中國的旅順(總計達700件)等處。最詳盡的總目，見於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敦煌遺書總目索引》(北京，1962年初版，1983年再版)，這部總目也還不完整。

聖彼得堡東方學研究分所收藏品絕大部分由С. Ф. 奧登堡院士於1914—1915年俄國西域(新疆)考察團帶回，1909—1910年吐魯番考察團亦帶回部分寫卷。此外，尚包括1906—1909年С. E. 馬洛夫于闐考察團、П. К. 科茲洛夫黑城考察團帶回的收藏品漢文部分以及1909—1910年間俄國駐烏魯木齊總領事H. H. 克羅特科夫收集的一些寫卷。所有這些部分自上述各考察團從中亞返回後，業已成爲亞洲博物館(現爲聖彼得堡東方學研究分所)的

財產。但能說明其入庫情況的文件幾乎沒有，而每一位收藏者所轉交的寫卷數量亦無確數。憑某些寫卷上及運送布袋、紙包上的記錄可推斷屬於 Н. Н. 克羅特科夫第二批收藏品者有 183 件寫卷，屬 С. Е. 馬洛夫收藏品的約有 30 件寫卷，屬 С. Ф. 奧登堡 1909—1910 年(未注明考察團名稱)收集的(收自新疆沙漠綠洲當地居民及發掘所得)有 477 件寫卷。

目前敦煌特藏登記入冊者總計 18,000 餘件。館藏中已清理判明部分分爲五類，代號如下：

1、代號 Ф(取自研究員 К. К. Флук [弗魯格] 姓的第一個字母)，計 366 件；幾乎全都是寫卷，顯然是經 К. К. 弗魯格挑選過的，或多或少是完整的寫卷。

2、代號 ДХ (Дуньхуан[敦煌]之縮寫)，計 18,000 件。屬該代號名下之寫卷大抵不是殘篇，就是篇幅不大的文本。

3、代號 М (С. Е. Малов[馬洛夫]姓的第一個字母)，計 7 件。此是 С. Е. 馬洛夫選出的古維吾爾文獻及殘篇，單獨存放。

4、代號 Дх жиВ.(Дх畫)，計 71 件，絹畫和紙畫。現已送去修復並在埃爾米塔什博物館展出。

5、藏文寫卷，約 200 件手卷。由 Л. С. 薩維茨基編寫注記目錄。

庫藏清冊由 М. П. 沃爾科娃、Л. И. 丘古耶夫斯基、Н. И. 諾索娃、孟列夫編製。

館藏文獻的研究工作始於本世紀 20 年代末。當時日本學者狩野直喜影印公佈並研究了《文選》(Ф 242) 及寫卷背面的《禮記疏》。30 年代，К. К. 弗魯格對庫藏作了辨析、清理編目和註記，結果寫成論文，論文敘述了館藏中佛教的和非佛教的一部分最重要的寫卷，在其博士答辯論文中對館藏作了總的評述(1959 年發表於《10—13 世紀宋代刊本書歷史》)，涉及代號 Ф 目錄卡片 307 個編號和代號 Дх 注記目錄 2,000 多個編號。К. К. 弗魯格死於

1942年初列寧格勒被圍困期間，該項工作遂中斷。後根據 И. А. 奧爾貝利院士、В. С. 科洛科洛夫(即國質生)教授和孟列夫的倡議，這項工作又於1957年重新開始，並一直繼續至今。在此期間出版了兩輯《館藏文獻彙錄》，發表了有關變文和佛教俗文學(讚文，宣講)的著作，《敦煌漢文文書》第一卷和一些篇幅不大的出版物。

參加館藏文獻研究工作的，最先是 М. И. 沃羅比耶娃·捷霞托夫斯卡婭、И. С. 古列維奇、孟列夫、В. С. 斯皮林、С. А. 什科里亞爾(史更良)，後參加進一步研究的有 Е. А. 維諾格拉多夫、Л. К. 帕夫洛夫斯卡婭、Б. Л. 斯米爾諾夫、З. Я. 哈寧、Л. И. 丘古耶夫斯基、М. И. 捷米多娃、И. Т. 佐格拉芙(左義林)、А. С. 馬爾得諾夫、鄺麗嬌。敦煌文獻研究小組汲取了國外一些專家，如 P. 戴密微、任繼愈、胡厚宣、鄭振鐸、小川環樹、藤枝晃等的意見。除上述出版物之外，館藏文獻簡目也出現在矢吹慶輝、孟列夫、藤枝晃、山本達郎的著作中。出版物和注記目錄在國外引起了反響，P. 戴密微、金岡照光、M. 多利杰洛瓦·弗林蓋洛瓦、Дж·達德布里奇都援引過這些目錄。前蘇聯敦煌學學者的著作榮獲1964年法蘭西學院銘文和美文學聖·朱利安娜獎。

目前館藏文獻的研究工作正循着下述幾個方面進行：繼續編寫寫卷的彙錄(Л. И. 丘古耶夫斯基、孟列夫、鄺麗嬌)；準備尚不為人所知的變文碎片和偽經的付印工作(孟列夫)；研究並準備發表經濟文書、法律文書和官方文書(Л. И. 丘古耶夫斯基)。

聖彼得堡東方學研究分所敦煌館藏大部分寫卷係佛教寺院文獻，故以佛教經藏為主。總藏量中僅1,000餘件屬其他領域的漢文文獻。在東方學研究分所敦煌文獻已出版《彙錄》的那一部分中，非佛教藏本有如下九類：

1、文書，411件。看來該類文書由縣衙與寺院之檔案資料組成。檔案組成甚繁雜，其間匯集了各種性質的資料。無論就紙幅

或就內容之容量而言，差別均甚大。其中既有獨立的頁和殘片，亦有大幅寫卷(如Φ336 田地清冊、Φ109 背面之目錄)。文書按其內容又可分爲如下七類：

- a, 經濟文書(債契、地畝、牲口和收成清單，交換文書、買賣契約)，51 件。
- b, 寺院文書(收支、獻祭帳目等)，37 件。
- c, 借貸文書(債務清單)，65 件。
- d, 官方文書及社團文書(報告與密報，指令、呈文、轉帖與申訴、衙門案宗、驛道證書等)，86 件。
- e, 民丁、和尚、尼姑人口清冊，34 件。
- f, 信件和信件草稿，36 件。
- g, 圖書館文獻(目錄、補缺清單，增補和整理寫卷的捐款等)，87 件。寫卷附言和卷尾題記均歸此類。

應當說明的是，此種分類在仔細審定時，可能會因無嚴格界限而具有假定性，例如，可將法律文書類(在經濟和官方文書中此類文書甚多)和一些文書(例如債契、目錄、清單)歸入官方文書；社團文書則與經濟文書關係甚密；圖書館文書又多與寺院文書近似，等等。

2, 歷史文獻和立法，23 件。在收藏品中祇有此類文獻之殘卷。其中有《唐律》殘卷，《春秋左氏傳》殘卷，關於公元前3或4世紀秦王朝衰落的佚著《楚漢春秋》等殘卷。

3, 儒教典籍，36 件。大部分爲《孝經》和《論語》殘卷，也有注疏類之著述，最完整的文本爲前述《禮記疏》(Φ242背面)。

4, 道教經典，91 件。此大抵爲 6—7 世紀晚期道教經典《太玄真一本際經》殘卷。旅法中國學者吳其昱認爲此經本已散佚，隨敦煌文獻的發現重現於世。在其他一些經典中引人注目者有《道德經》(Дх1, 111)和《莊子》(Дх178)之小部分，一般認爲這類著述與傳世版本有相異之處。

5、文學作品，275 件，其中有：a. 散文作品（故事，漢武帝劉徹時期的文章、小說、駢文、跋文等），27 件。特別引人矚目者為《文選》大幅手卷，其中有尙未知為何人所作的注釋（Φ242，由狩野直喜發表；梁武帝[502—549 年在位]時代某些散佚之著述），未定名類書殘卷（Дx-970，Дx-6116），各類故事殘卷 13 件。

b. 詩歌，40 件。其中有 6—7 世紀詩人王梵志尙未定名詩集寫卷結尾部分（Φ256）；唐代詩人散佚詩的一些殘卷，其中有岑參（715~770）的詩歌。

c. 變文類作品，56 件，其中有維摩詰經變文寫卷 2 件（Φ101，Φ252），《十吉祥變文》（Φ223），《雙恩記變文》三卷（Φ96）等寫卷 4 件；《法華經變文》（Φ364）寫卷 2 件。其餘均為碎片。

d. 各種書信，38 件。

6、辭書及學習漢字參考書，50 件。應指出的是辭書《切韻》散佚部分殘卷，其他部分以前曾散佚，後由中國學者劉復依據法藏敦煌文獻資料公諸於世；辭書《一切經音義》若干殘卷（達 10 件，其中全卷 2 件），《詩經字錄》殘卷 2 件。

7、醫學著作，2 件，一些專著殘片，主要論述針灸。

8、天象風水文獻及與此有關的曆法書，36 件。

9、書法習字（可能是習字帖之殘卷），94 件。

佛教文獻，此類卷子無論在我國還是在外國藏書館均構成收藏品之絕大部分，主要可分為兩類：由佛經組成的翻譯作品和未入佛教經典內但與之有關的中國佛教撰作。第一類即佛教經典著作，為數最多，超過 80 種經名，且其中許多經有大量抄件。以下為最常見著作抄件數的概略資料（在初步清理中未定名的殘卷中很可能還會發現許多殘卷）。在指出抄件總數的同時，我們還提請讀者注意各經全部抄件中完整寫卷的數量。

1、《妙法蓮華經》，1041 件，57 件為完整寫卷。其中該經文的第 25 品還曾以《觀世音經》之名單獨流傳，有約 300 件，其中完

整寫卷有3件。

2、《大般若波羅蜜多經》，692 件，完整手卷 64 件。此經雖容量極大(600 卷)，然幾無重複之文本。

3、《金剛般若波羅蜜經》，601 件。此經有三種同本異譯：

a) 鳩摩羅什譯本，595 件，完整寫卷 15 件。此譯本除基本譯本外，尚有分爲 32 分的流行本，正文前附有陀羅尼真言、偈文（傅大士編）及簡短跋文，以供在祈禱集會上頌唱本經文前念誦之用。這種本子並非寫於手卷上（因傳道時使用不便），而是書寫於不大的手攜小冊子上，既便於攜帶，又便於尋找所需之段落。在我館收藏品中，此種手攜小冊子有 63 件，前有傅大士附文者 8 件，此外，此本尚有一種特殊本子，附有插入式四行詩句（夾經文彌勒詩），2 件。

b) 菩提流志譯本，3 件。

c) 真諦譯本，3 件。

4、《佛名經》，451 件，完整寫卷 12 件。其中 3 件有佛像彩繪插圖，在寫卷的 4 卷中，在每一佛名上蓋有佛像刻印。在這些寫卷中有 74 件《佛名經》實際上屬於另一類作品，與編入經藏的同名作品不同，這些作品是從敦煌文獻中首次發現的，現僅有部分公之於世。

5、《大般涅槃經》(三十八卷)，312 件，完整寫卷 20 件，有分卷與常用本經文分卷不同者。

6、《金光明經》，近 250 件。在聖彼得堡東方學分所之收藏中有其 3 種譯本：

a) 《金光明最勝王經》，195 件，完整寫卷 14 件，義淨譯。

b) 《金光明經》，30 件，完整寫卷 15 件，曇無讖譯。

c) 《合部金光明經》，14 件，完整寫卷 1 件，闍那堀多、真諦編譯。

7、《維摩詰所說經》，鳩摩羅什譯，206 件，完整寫卷 8 件。此